

第十一章 《波茨坦公告》与天皇制

公告的起草者

左右战后的日本命运的《波茨坦公告》，是在太平洋与日本战争着的美、英、中三国的对日最后通牒。只是这一公告与同盟国对德提出的无条件投降不同，明确地要求有条件的投降。日本人对于允许天皇制的继续存在感到特别地关心。这是因为同盟国在这一阶段不得不考虑大战后的世界格局，而且也不愿再付出大量的牺牲，当然，公告中绝无只字提到，要改变战后控制日本的方针。可是，当时日本国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天皇制的问题怎么办？但读遍全文仍不得要领。铃木首相对此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方针。

但这是公告的起草者长时间推敲的，删了又添、添了又删，努力使言辞既不过于和缓、也不过于刺激，使之比较恰当。《波茨坦公告》草案的起草者，是曾“在日十年”的著名的原驻日大使、当时的代理国务卿约瑟夫·塞·格鲁，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原稿作者，国务卿特别助理尤金·霍·杜曼则鲜为人知。杜曼出生于日本，曾就读于九段的晓星小学和奈良的郡山中学。

“天皇陛下想听听《波茨坦公告》的来龙去脉，因此我奉召进宫，那是在难忘的1950年12月4日。那时面食类尚不能自由出卖，复兴更茫无头绪。也许是这个原因，我候召所呆的宫内厅的中小房舍也显得破旧、寒伧和贫穷。需要说明的是，为何要由我来向陛下呈报这一情况呢？这是因为我在终战时，是外务省调查局第三课课长、并兼任内阁情报局的情报官，从1949年6月起还是运输审议会委员。”

这是太田三郎氏的回忆。他谈道：“说起来我是因运输审议会的工作于1950年赴美国时与国务卿特别助理尤金·霍夫曼·杜曼会面的。杜曼原是驻日大使馆的参赞。那时，杜曼起草了《波茨坦公告》的最初草案。当时美国国务院和社会舆论，对于日本，尤其对于天皇制持有错误的认识，相当多的人主张废除天皇制。杜曼对我说，他要努力地批评废除天皇的观点。

当时由于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所以感到很兴奋。我回到日本，与好友松平武部官长谈起了这事。我思量着，如有机会的话，可以通过松平君把此消息传给陛下，没想到因此受到召唤，由我直接向陛下禀报。

由于我是情报局的情报官，所以在《波茨坦公告》发表时，我能最早地读到。从公告的语调和内容看，当初就感觉到这可能是杜曼写的。

第一次见到杜曼的时候，我正在伦敦大使馆工作。那时，驻马赛的领事曾送来新鲜的金枪鱼。由于有金枪鱼，所以与当时的大使松平恒雄谈起想做寿司饭。大使说，这样的话请把美国大使馆的杜曼请来。

喜欢寿司的美国人，现在已不足为奇了，但在当时却有‘奇怪的外国人’的感觉。一见那位美国人，确实能做寿司，而且日语极流畅，并带有关西音，这更使人感到惊讶。”

太田三郎氏继续说：“那位带关西音的奇怪的美国人，经询问，得知其父以牧师身份来到日本，他是在大阪出生的。以后因其父任东京教会学校的教父到了东京。他也就读于东京九段的晓星学园。不久，其父又到奈良任教会学校的校长，他就进了郡山中学。他在13岁时回到美国，从中学到大学毕业，并进了国务院。我是在伦敦时与他相识的，此后就成了好朋友。

据说外务省的老前辈谷正之氏和客死美国的斋藤博大使等都与杜曼私交甚笃。伦敦时期他是一等秘书官，归国之后任国务院日本课课长。大约是在1932、1933年左右，格鲁任驻日大使时，他

被邀再度赴日，直至因战争回国。可以说他是美国一流的日本通。

终战不久，美国占领军的士兵送来一封信，拆开一看是杜曼写的。信中说：‘我想没什么麻烦事的，若有追究你战犯责任的事，我随时都可以出来给你作证，请别担心。’我感到这是真正的朋友。从那以后，我们恢复了通信联系。1950年，因运输审议会的工作到美国时，就想去看看他，与他一联系，他就让我到他家里去住。战后，他退出了国务院，和夫人一起在康涅狄格州的里奇菲尔过着隐居的生活。旧友相逢，通宵畅谈，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5时。说的就是《波茨坦公告》形成的内情。杜曼拿来大包记录，系统地向我介绍了事情的原委……。正因如此，所以要我这个当时并非外交官的人来向陛下汇报情况。开始的情况我尽量简略，主要介绍最后阶段的情况：

‘……对日战争已接近尾声，美国政府需要给驻日总司令麦克阿瑟指示具体的占领政策。这是个重大的问题。讨论时，提出了许多的问题，但核心仍然是天皇制。’

陛下频频地颌首称是。”

保存天皇制也符合美国利益

当然，并不是说天皇制可以原封不动。太田三郎对陛下说道：“据杜曼所说，开战不久，美国关于天皇制的舆论是十分激烈的。认为天皇制虽是宗教，但这个国家的神道违反宗教自由的原则、与日本的军国主义紧密联系，强迫着国民的信仰。这是极容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的观点，是不了解日本实情的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他们对天皇制怀有恐惧心。据说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不除去天皇制，日本就无法民主化。尤其中国绝对要求废除天皇制，甚至指出天皇是第一号战犯，应该在东条之前绞首。”

国务院远东部的的主流是中国派。中国通几乎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所以，他们是否真正地懂得并理解日本，这是令人怀疑的。

事实上，在格鲁任副国务卿时，中国派的巴兰坦尼任远东部的部长，据说是格鲁的劲敌。而且在民间，有十分了解中国的奥恩、拉斯姆等太平洋协会一些人所提出的强烈意见。后来听说这个协会内有共产系的人物，但他们都以日本通自居，在美国有很大的号召力。这个协会的成员都主张废除天皇制，并认定天皇是战犯。就是说，他们似乎持有一种偏见：问题不在陛下个人如何，天皇制本身就是好战的，只要保存天皇制，日本就不能摆脱军国主义。

罗斯福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在战争期间，国务卿由‘德国派’的斯特蒂尼思、副国务卿由‘日本派’的格鲁担任，他俩都是熟悉敌方的第一流的德国通、日本通。但是，格鲁在刚入国务院时，只是长官特别顾问，虽在国务院有办公室，但不必每天上班；在例行会议等场合，也很少有发言的机会。而且，当时的国务院正忙于起草关于占领德国的政策，关于天皇制的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至少是到了1945年春，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如上所述，战争虽已接近尾声，但由于美国当局预计战争将于1946年(昭和21年)春结束，所以对此并不着急。到1945年春，才正式地研究日本问题，这时，格鲁先生已成为代理国务卿，杜曼也担任了国务卿特别助理的要职。

就在这个时候，杜曼写了包括天皇制问题在内的关于占领日本政策的论文。据杜曼说，这篇论文是《波茨坦公告》的基调。

后来我们还得知，格鲁先生在5月28日写成了敦促日本投降的宣言书，并送给杜鲁门总统过目，催促总统尽快发表。这个草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日本投降的13项条件，其中还明确地写上了保存天皇与天皇制。格鲁对总统解释说：如果不明确这一点，日本是不会投降的。

杜鲁门总统对此原则上表示同意，并嘱咐格鲁，要与陆海军首脑商量，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于是，第二天(29日)，格鲁与陆海军首脑作了商谈。陆海军方面只是希望能延迟发表的时间。所以，直至波茨坦会谈的时候，在《波茨坦公告》之中，关于天皇及

天皇制度的问题，言辞仍然使人捉摸不透。

回避天皇制的问题，主要是考虑到反对派的意见。格鲁与杜曼在将此宣言给总统过目后，成立了关于对日占领政策的小委员会，在这个小委员会上，他们与各部的反对派进行了激烈地辩论。他们认为，保存天皇制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拥护者的强烈要求

当然，这些话陛下也是首次听到，但事至今日，由于根据当事者们的经历写出了许多资料，所以能够了解得更详细、更准确了。为避免重复，根据资料想理理这一线索。

我们先来看看约瑟夫·格鲁的《激动期》一书(当太田氏与杜曼会面时，格鲁此书尚在撰写中)的《日本的投降》中的一节：“我与日本人有广泛而直接的接触，我了解他们的心理与思维方式，我始终坚持据此而得出的这个观点：美国总统必须表明，倘若日本人民自己希望皇室的存在，那么美国所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废除现在的皇室。否则，即使日本覆灭了，日本的投降也不是完全的。

而且我坚信，如果这样的声明在1945年(昭和20年)5月26日前后的B29型飞机对东京大空袭后立即发表，将孤立主战论者(不妥协的军人)，增强天皇与支持者的主和方面的声势，通过这样的声明有可能拓开使日本早期投降的途径。况且，总统已有宣言表明，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日本民族的灭绝与奴隶化(指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后不久的宣言)，所以此时再发表声明，能使前述宣言更正当化和加强，我相信这对于正在歧路上徬徨的日本效果更著。

我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理解日本国情的国务院的专家们的支持，其中尤其是尤金·霍·杜曼和乔治·哈·布莱克斯利(国务院远东区委员会主席)。于是我于5月28日向总统递交了国务院经

过深思熟虑的草案(即以杜曼论文为基础的)。”

关于这次会见杜鲁门的情况，格鲁的记载说：“1945年5月28日早晨，在我的要求下，求得了杜鲁门总统的约见。下午7时35分，我同萨弥尔·罗德曼法官(总统特别顾问，我事先与他谈了该问题)一起前去拜见总统。我首先向总统说明了我们的访问的目的：在对日战争中，从现在到将来不再有牺牲，这是基本的目的。就是说，不仅要在目前的战斗中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国人的生命损失，而且在今后也要消除日本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所以要破坏他们的武器和武器制造能力，尽可能地肃清他们的军国主义。这就必须使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不过要有使日本人较容易接受的无条件投降的措施。

我们必须考虑到日本人是狂热的民族，在最后关头有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可能性。如此的话，美国人生命的牺牲是不堪设想的。但对于日本人来说，无条件投降的最大障碍，是天皇制的存废问题。

以前蒋介石曾向他的军队正式申明：虽然他的国家受到日本的损害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多，按他的意见，日本失败后如果能忏悔，可以允许日本人建立自己所希望的政治体制(这是在开罗会议期间，在罗斯福向蒋介石征询意见时，蒋的回答，并于1944年元旦广播讲话中再次重申)。

认为日本天皇与天皇制具有产生攻击性的军国主义根源的人们，对日本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大约700年间，日本的天皇被夺去实际的皇帝权位，在京都过着不安定的生活，驱逐了天皇的将军们在东京支配一切。在16世纪，与中国和朝鲜进行战争、傲慢地要征服世界的，不是天皇，而是将军秀吉。1868年，进行恢复王政的明治天皇，是个能制服军国主义的将军们的实力派人物，从而使日本走上了温和的道路。

但是，继明治天皇之后的天皇们却不是强有力的人物，所以军国主义者们可以扩充自己的势力，比较容易地操纵天皇。如果

裕仁在1941年不支持军队，不承认宣战诏书，他的命运与他的先祖恐怕会不一样。与其说他是好战者，不如说他无力抵御军国主义野心的汹涌潮流。这些事实明确表明，日本的军国主义并不需要天皇，所以不能说由于天皇而造成日本的军国主义。

1936年2月的暗杀事件(二·二六事件)是以清除天皇身边的和平主义者为目的，由军队中的激烈分子发动的事件。

准备攻击珍珠港的东条将军和他的同伙们，正如过去的将军们一样，是军国主义的领袖；天皇虽有自己的主张，但是要阻挡他们也无能为力……”

我们可以感到格鲁和他的同僚对维护天皇与天皇制的热情。

声明推迟发表之际

“……由于天皇在宣战诏书上签了字，所以是不能逃避其责任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即使天皇不签字，将军们也要走他们自己的路。

在军方的过激主义者因战败而威信扫地时，天皇纯粹是作为‘象征’将被新的领袖利用，人们期待着新的领袖取代军人。当日本人懂得了依靠军人将一无所得的时候，天皇制自然就成为建筑这个国家未来和平的基石……”

格鲁在向总统作了如此说明之后，将经过长时间酝酿而拟成的声明书原稿(即《波茨坦公告》的底本)递交给杜鲁门总统，并告诉总统，国务院的设想是5月31日发表，越快越好。

“总统说他很注意我的说明，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想法。但是，他要求我先与马歇尔陆军参谋总长和金格海军作战部长等陆海军长官讨论一下。随后又说，把他们叫到白宫开个会，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我表示将在翌日上午安排这个会议。”

会议于翌日上午11时，在五角大楼的史汀生陆军部长的办公室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的格鲁和杜曼、OWI(战时情报局)

局长爱尔曼·史密斯、总统顾问罗德曼法官，还有史汀生陆军部长、弗兰克海军部长和马歇尔参谋总长，金格部长因事未来。

格鲁继续说：“会议持续了一个小时。在讨论过程中，史汀生、弗兰克、马歇尔将军原则上赞同，但是，据说是因为军事上的理由，不能催促总统马上发表这个声明。发表的时机问题是讨论中的焦点。我向总统汇报了会议的意见。”

据杜曼的记忆，坚决反对的只有史密斯一人，其他人都全部赞成，只是认为因为“某种军事理由”发表的时间尚早。所谓“某种军事的理由”，格鲁认为，这是因为当时冲绳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之中，这个时候发表此声明，恐怕会使日本人误以为美国方面在示弱，使日本军人更加负隅顽抗；似乎没有想到这与原子弹有关。但《史汀生日记》中说：“格鲁主张向日本发出警告，以此为题而召集了这个会议，这是个麻烦的会议。因为出席这个会议的人不了解，而且也不能让他们了解，有关左右整个局势的原子弹研究的现状。但格鲁了解原子弹的情况，所以由他主持这个会议。”

总之，格鲁确实是很失望的。因为当初他向总统建议，在5月31日、即26日的东京大空袭后就发表此声明，而总统则认为需要同军事当局商议。于是在29日的会议上产生了上述的结果。但是格鲁并不气馁，当冲绳战斗结束后，他认为这是个较好的时机，于6月18日再次向总统提出了这一要求：“6月18日，我于早上9时半去见总统，希望总统考虑与攻占冲绳的公报一起发表。总统虽然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决定在最近将举行的波茨坦三巨头会谈之前暂不发表。我根据总统的指示，告诉哈·弗·马休斯（国务院欧洲局局长），在三巨头会谈的协议事项中促成这一事项。”

然而，格鲁仍在努力。就在他为此焦虑期间，贝尔纳斯担任了国务卿，格鲁立即努力使新上司重视这个声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贝尔纳斯的就职宣誓，离他到波茨坦只有三天了。“在这几天里，他（指贝尔纳斯）忙于准备波茨坦会议，所以我是在他将去波茨坦的那天早上，才把宣言的草案交给他的，就是我给

总统看过的那份草案。当时贝尔纳斯正从国务院出发去机场(正确地说,贝尔纳斯并未去机场,而是乘总统专列,当夜去了新港和新闻社)可说是在他出发前的最后时刻,我把我们的草案塞进了他的公文包。”但是,贝尔纳斯不仅把草案放在包中未看,而且最后也无所行动。贝尔纳斯在出发前,打电话给前任国务卿赫尔征询意见,而赫尔是国务院中势力强大的反对派的中心,所以格鲁依然放心不下。

促进发表的协力者

贝尔纳斯和赫尔的电话内容见于《赫尔回忆录》：“1945年7月,贝尔纳斯国务卿在出发去波茨坦参加会议的前夕,往我家打了电话,说明了杜鲁门总统给他的、在波茨坦会议上预先准备的公告草案包括这样的内容:如果日本响应和平,可以允许保持天皇制。

贝尔纳斯征询我的意见,并告诉我这得到了国务院、陆军、海军的首脑们的承认。因为是在他临出发前的数分钟,所以不能将文件抄下给我送来,但是我告诉他我觉得这个公告案对日本是过于宽容了,尤其是我们过去的态度一直很强硬,强调无条件投降。

我还指出:那个草案不仅保证维持天皇制,而且许诺保障天皇以下的统治阶级的封建特权。我认为必须彻底剥夺天皇及其统治阶级在法律外的全部特权,必须使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赫尔对此并不放心,还通过格鲁给在波茨坦的贝尔纳斯打了电报,电文收于《合众国外交文件》:“1945年7月16日,由代理国务卿(格鲁)转国务卿(贝尔纳斯),最高机密。赫尔关于敦促日本投降的原稿,有以下的补充要我转告于您:

詹姆斯·弗·贝尔纳斯国务卿亲启

我的意见涉及到全文,尤其是第12条就是主张承认天皇制的

继续存在的部分，原稿是这么写的：‘……如果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确信其政府将实行和平政策，使攻击性的军国主义将来不可能发展，可以保存现在皇室下的君主立宪制’，这一条取得了陆、海军首脑和副国务卿的支持，大约是经过充分讨论的，但我却持有异议。虽然我相信，主张保存天皇与天皇制的人们是试图以此缩短战争、拯救同盟国军战士的生命。万一这种方法成功了，确实可以说是有很大效果的。但目前没人知道这个提案的实际效果。日本军国主义者会竭尽全力妨碍这个宣言，并且要考虑到会鼓起日本人勇气的反作用。如果那样的话，美国国内也可能发生可怕的政治反对浪潮。所以，这个宣言的发表是否等到了同盟国军队攻击的最高潮和苏联参战后更好些？”

赫尔

对此，贝尔纳斯于第二天(17日)作了答复，仍经由格鲁代理国务卿转交给赫尔。这一答复也收于《合众国外交文件》之中。他是这么答复的：“我同意宣言推迟发表。如果发表，也应象您所说的不包含‘阐明’。”

格鲁将此用电话通知赫尔。赫尔询问“阐明”是什么意思，格鲁回答：可理解为“某种阐明”。虽然他们的问答似像禅一般令人不解，但据格鲁自己揣摩，贝尔纳斯承诺了赫尔内心所主张的，在宣言文中删除第12条有关天皇制的部分。

格鲁也许很遗憾，他是把这个宣言案视为自己的政治生命的，与志同道合者写了原稿，并努力促使其尽早发表。但上司又越过了他而与前任上司商量，并作出了延期发表的决定。

但格鲁也不必那么悲观。他的知己史汀生陆军部长作为非正式随员，“混入”了搬到波茨坦的“白宫”之中，代替格鲁催促着宣言案的早日发表。当然，这是因为他最早得知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所以到了波茨坦后急于要发表作为对日最后通牒的这个公告。

顾虑日本的误解

我们把目光转向在波茨坦的“小白宫”。

在波茨坦，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重大消息使事态发生了变化，这是国务院的留守干部们所不知道的。就是说，已经作出了在原子弹成功后将对日本使用的决定。但是，不能没有警告就直接使用，所以必须发表一个对日最后通牒，这时恰好带来了格鲁手拟的宣言案草稿。这份宣言案不仅是现成的，而且因为倾注了第一流的日本通的心血，内容上相当严谨，所以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对于“小白宫”的最高决策者来说，一些细微之处需要删去，议论的中心就集中在“能否明确表示保存天皇制？”和“能否使用无条件投降的用词？”这两点上。

先是在7月18日，总统副参谋长兼参谋长联席会议议长李海海军上将给总统送去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也收于《合众国外交文件》之中。这份备忘录是这样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议长呈总统
极密 1945年7月18日 巴贝尔斯贝格

参谋长联席会议议长递呈给您的关于国务院、陆军、海军所准备的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宣言案的意见。我从军事的观点上看，对于宣言在总体上是感到满意的。但是我认为第12条最后的内容更明确些为好。因为极端信仰天皇的人们，对于‘可以以现在的皇室为基础，保存立宪君主制’这部分内容，可能会误认为是要现在的天皇退位或让位，让皇室的其他成员来取代的意思。日本的激进分子对于这部分内容则会无视其中保存天皇制的诺言，恐怕会解释为可以继续象过去那样崇拜天皇。所以，是否把‘可以以现在的皇室为基础，保存立宪君主制’改为‘作为对以上侵略行为的适当的保证条件，日本人民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府’好些？如果是这样的声明，就不会有无论日本要实行怎样的政治体制，同盟国只支持特定的政体这样的印象。这样，同盟国也能阻止同盟国

所不能承认的政府的建立,并且对各阶层的日本人民都有号召力。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我认为这个时候,要利用能够命令日本本土与海外日军投降的天皇的权威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发表这样的声明或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不明智的。”

随后,史汀生也给总统送来了备忘录……

主张保存天皇制的陆军部长

陆军部长史汀生在得到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的翌日(7月16日),就劝说杜鲁门总统有必要尽快再讨论“那个宣言案”;在7月20日又向总统递交了备忘录。此备忘录也收录于《合众国外交文件》之中。这份备忘录是这样的:“陆军部长呈总统 极密
1945年7月20日巴贝尔斯贝格

对日通牒第2条如下:‘美国、英帝国及中华民国之庞大的陆海空部队,经由西方调来的陆军与空军的支援,已增强数倍,严阵以待,将予日本以最后的打击。彼等军事力量表达所有盟国之决心,并得到所有盟国的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

我对此条最后的‘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用辞感到不解。我认为可将此改为‘直至日本停止抵抗’,这样的变更有以下两条好处:

一、无条件投降的用辞在这里是不必要的,如果不用这一言辞,较易于使日本人公开承认继续战争是无效的。

二、不致于使日本人无所适从。要求日本人无条件投降这一用辞,若被译成非常混乱而低劣的日语,也许难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此外,我赞成1945年7月18日联合参谋长会议议长(李海)的备忘录对于第12条的修正。”

总之,根据这份备忘录,史汀生赞同李海的意见,在第12条

中避免涉及天皇制的问题；与此相交换，要撤除第2条中“要求无条件投降”的用辞。

就备忘录字面上看，关于天皇制问题，史汀生没说什么，其实他的意思不仅要删掉“无条件投降”的用辞，而且还婉转地认为“只要不允许保存天皇制，日本人不会投降”，这在《史汀生日记》上有明确的表示：“史汀生日记 7月24日

……那以后(递交备忘录之后)，我又对杜鲁门总统解说了‘保存天皇制’的重要性。有向日本作出保存天皇制保证的必要性。在正式的公告中加上保存天皇制的内容是很重要的，这决定着日本人能否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我听贝尔纳斯说，他们(意即不止他一人)不喜欢加上那样的内容；而且，现在要作这样的变动，事先要征询蒋介石的意见，据说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得知日本人对于承认《波茨坦公告》存有疑虑，我希望能考虑通过外交途径，哪怕在口头上向日本人作出一条保存天皇制的保证。总统对此很重视，并表示要考虑一下……”

就是说，公告文要经过蒋介石的签名，因为副本已经送去了，所以再要变更就来不及了。但在实际发表的公告文中，根据史汀生的主张，在第2条中删去了“无条件投降”的用辞；根据李海的意见，在第12条中没有直接谈到“保存天皇制”的问题。虽然在第13条中有“无条件投降”的用辞，但这只是对日本军队的要求。在读《波茨坦公告》时，这两点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格鲁代理国务卿为保存天皇制和早日发表此公告而费尽心力，现在终于实现了，他对史汀生十分感激，在《激动期》中写道：“在陆军副部长助理杰克·麦肯罗赴欧洲时，我请他转告史汀生，这个问题我感到非常重要。为促使总统和丘吉尔先生决定发表这一公告，在波茨坦，史汀生鼓足精神十分活跃。如果没有史汀生的热心倡导，波茨坦会议也许将会以不向日本发表任何公告而告终。但是，即使是史汀生，也不能使公告中含有这样的保证：倘若日本人希望保存天皇制，就不意味着排除皇室。”

国务院对内容的苛刻解释

作为文章，无论怎样反复推敲，也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何况政治上的文件不是文学作品。公告自公布的瞬间起，就完全脱离了作者的善意和真意，只剩下等待逐条解释的冷冰冰的文字。尤其是慎而又慎的外交文件，其“阅读方式”（即解释），在平常也是由当事国一方预先约定的，战胜国给战败国的文件也一样，因为接受国总想从有利的方面来阅读，所以给予国甚至可以随意变动其解释。

7月30日，共有13条内容的《波茨坦公告》发表刚刚四天，美国国务院就逐条规定了对公告的解释。该解释极苛刻，我们日本人读后，甚至会有这不是该公告的解释的感觉。该解释是如何产生的呢？不知公告原稿的起草者格鲁和杜曼是否参加了对公告的解释？这份作为国务院解释的文件被收于《合众国外交文件》之中。

与格鲁和杜曼过去起草该公告原稿时一样，该公告在国务院中就有很大的反对势力。而且公告发表之后，国务院又渲染了舆论中的不满，再考虑到日本对公告采取置之不理的政策——这个具有决定因素的背景，国务院中必然采用强硬的解释。由于该解释决定着占领政策，也许我们不得不予以重视。解释很长，作为结论，我们列表对公告与国务院的方针作一番比较：

一、关于无条件投降

公告：全部日本军队的无条件投降。

方针：解释为日本、即政府和军队的无条件投降。

二、关于条件

公告：根据所说的条件，给日本以结束战争的机会。

方针：日本必须服从同盟国军队方面的全部命令。但同盟国军应预先公布有关日本的基本政策。

三、关于驻日盟军在法律上的统治

公告：应占领日本指定的地点，在这些地点之外没有明确的权限。

方针：盟军接收日本政府，具有最高权威。

四、关于日本政府

公告：日本政府的地位虽不明确，但可以保持并运用某种机能。

方针：日本政府的全部权限移交给盟国，行政机构与一般机关，在同盟国的命令之下待用。

五、关于天皇

公告：没有涉及。因为没有明确说明要天皇下台，所以有保存天皇的设想。

方针：天皇必须签字并发表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他的权力移交给同盟国。在同盟国的保护下等待处理。

六、关于目的

公告：必须摧毁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及其军事力量。确立尊重言论、宗教、思想自由等基本人权和倾向和平、具有责任感的政府。

方针：基本一致。（下略）

实际的占领政策，大体上可说是与国务院的方针相符的。但在此特别要指出的是，第5条有关天皇的部分中，天皇必须签字并发表无条件投降书的规定，实际上并未执行。对于《波茨坦公告》，日本后来表示：“在明瞭不包含变更天皇作为统治者的要求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对此，杜鲁门总统明确了美国的态度，并征得伦敦、莫斯科、重庆的同意。其中，有让天皇到大本营签署投降文件的内容。艾德礼和贝宾同意美国的提案，但提出了一点修正意见：“我们怀疑让天皇在自己的投降条件下署名是否明智？因而，要给予并保证天皇在日本政府与大本营签名的权限。”蒋介石和斯大林对此的答案是：按美国的意见办。杜鲁门按

英国的意见，没再要求天皇的签字。拥有国王的英国人理解天皇的权限和名誉，也许不愿使天皇品尝签署投降文件的屈辱。

在太田氏讲完后，陛下说了这么一句话：“格鲁，他不能到日本来吗？”

太田听了后，据说心中扑通一跳。但这是很敏感的问题。太田明白，格鲁与麦克阿瑟关系不睦，决不可能与麦克阿瑟共事，于是他回答说：“在麦克阿瑟在日本期间，哪怕作为旅行者，格鲁大约也不会到日本来。”

太田寻思，格鲁到日本来的话，天皇或许想以某种方式向他表达自己的心情。但格鲁在那以后，却因国务院内的舆论压力，在8月15日，即终战之日辞职了。1960年5月17日，日本赠给杜曼二等旭日重光勋章。稍后，在9月29日，日本赠给格鲁一等旭日重光勋章，这是为纪念日美百年修好而去美国的皇太子夫妇特意送去的，授予仪式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举行，只是据那时日本的新闻报道，原驻日大使格鲁“因年老而未出席”。时间或许是无法抗拒的，但这总算表达了陛下的心情。